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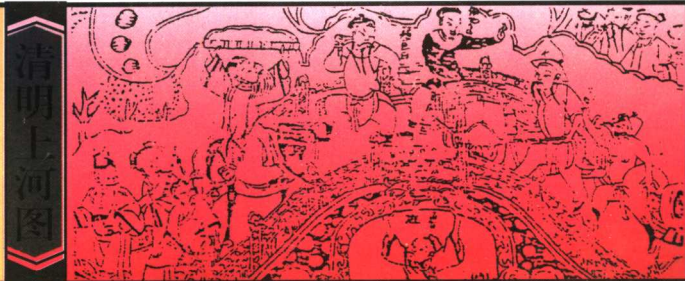
河南出版史话

海继才
温新豪 著

河南雕版



宋金木版



清明白河图

坊间印刷

社

6.1

序

邓质钢

我是新闻战线上的一位老兵，对图书出版研究不多，可海继才同志要我给《河南出版史话》写个序，说心里话，我实感为难。但作为对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支持，我写点自己的看法，以作为序。

据我所知，出版史要早于新闻史，但对出版史的研究却远远不如新闻史。就宏观上来讲，全国对出版史的研究著作虽有一些，但全面系统研究出版史，并具有一定深度的力作还不多见。从地方来讲，对出版史的研究就更为薄弱，研究的空气也较为冷清。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省的出版部门，重视并加强了对出版史志的研究工作，如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河南等都相继成立了地方出版志办公室，先后编撰了一些本省的出版志书，这对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图书文化，繁荣新时期的出版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海继才、温新豪二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收集古

代大量散失材料的基础上,以史话形式撰写了这本书。对于该书我认真读了一遍,觉得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资料较为翔实,有些史料还是过去很少见到和披露的,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和研究价值,有些篇章也有较强的可读性。在当前对古代出版史研究缺乏资料,研究费时费力而往往还出现争议的情况下,他们二同志不怕困难,历尽辛苦写出了这本书,这种治学精神和理论勇气是可敬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中国的民族图书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进一步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对继承和弘扬民族图书文化,繁荣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愿我们更多同志,尤其出版部门的同志能积极参与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为优秀的民族图书文化进一步光大,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作出新的努力。

鉴往事 明治道

（代自序）

“鉴往事，明治道。”翻开中华文化历史的长卷，源远流长的河南出版事业曾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在今日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河南的出版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加以研究，循规明法，使古老的传统图书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新时期的河南出版事业在坚实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里，以全新的内容、全新的思维和全新的观念茁壮成长，这是历史的任务，也是现实的需要。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对古代文化遗产一直采取近乎虚无主义的态度，尤其对出版历史的研究，更是冷落寂寞，至今河南出版无史的现状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出版作为直接的文化积累和建设，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都是与重视人才、重

视教育和文化建设分不开的。西方一位政治预言家断言：谁想拥有未来，谁就必须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失去了教育和文化建设，就等于失去未来。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把物质生产搞上去不易，把精神生产搞上去更难，而且社会主义文化从总体上讲，不可能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自发产生。因此，我们必须要花很大的气力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培植和维护自己的文化根基，创造出符合世界文化进程的新文化。建设新的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新文化的建设是不能和传统文化相脱节的。因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东西，它不会随历史的变化而消失，而是在这种变化中促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富有生机。无论历史的兴衰、王朝更替变化多大，作为极其深邃并有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永远是延续的，谁忽略了这种延续，轻视或割断这种延续，谁就等于割断了历史文化，割断了未来，这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且不说全国，仅看一看河南古代出版历史过程，分析兴衰之原因，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例如北宋河南的雕版业之所以在全国保持中心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文化与经济建设及社会稳定的互补互动作用，采取了“武功克敌，文德致治”、

重视知识、重用文人、皇帝亲自组织重大经史典籍的雕刻等一系列国策和措施的结果。对于这些政策和办法，我们认为，今天仍然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文化本身的发展也需要兼融和吸收，不仅是国内的，而且也需要国外的。所以，我们要构建崇高博大的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图书文化，就必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达到古今中外之“贯通”的境界。今天，面对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图书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不“坐集千古之智”，共铸旧学新知，去努力实现这种“贯通”呢？

实现这种“贯通”是很难很难的，但重要的是参与。愿更多的人参与河南出版历史的研究，为建设和繁荣立足现代、面向未来的河南出版事业而奋斗。

目 录

序	邓质钢 (1)
鉴往事，明治道（代自序）	(3)
河南雕版之始	(1)
北宋河南雕版业	(5)
北宋皇帝与官府藏书的建设	(25)
宋金河南木版年画	(28)
清明上河图	(46)
明代河南的出版业	(54)
元明河南的私人刻书	(64)
明代河南藩王刻书	(69)

目 录

明代以前河南地方志出版源流考	(77)
明代河南地方志的出版	(80)
明清朱仙镇民间木版年画	(84)
明清河南书院刻书	(94)
清代河南地方志的出版	(102)
清代河南的坊刻印刷	(107)
清代河南的私人刻书	(113)
清代河南禁书及文字狱	(124)
民国河南地方志的出版	(132)

河南雕版之始

我国雕版印刷始创于何时，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北宋说，都各持以理，各有所见。但真正有记载和实物所证的是唐代。

元稹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为白居易诗集作序中提出：“乐天《秦中吟》、《贺雨》等篇……缮写模勒（模勒一般解释为刊刻），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处处皆见。”这说明在九世纪初期，已有人将白居易的诗文雕版印刷，并拿到市场上出卖或换酒茗。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唐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是公元 835 年 12 月 29 日，可见此时已有印刷的日历了。

唐柳玭《柳氏家训序》记载“中和三年癸卯夏（公元 883 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

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从这段记载里，可见在公元 883 年，不仅有印刷的历书，而且有印刷的其他书籍了。

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当时以雕版流行的诗歌、历日、佛经等已很普遍。此外，现有实物所证的是敦煌石窟所出的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王玠为二亲造的《金刚经》，它用六个印张贴成一卷，全长一丈六尺，高一尺，完整无缺。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现存最早的驰名中外的记有日期的印刷品，现藏于伦敦博物院（1908 年被英人斯坦因掠走）。

具体到河南雕版印刷业始于何时，至今无人考究。但根据唐代雕版业流行的历日、佛经、小学、小字书等人民大众日常所必需图书看，河南也肯定会有，但至今未发现文字记载和实物证明。有记载的是五代时期（907 年—960 年）在洛阳、开封的官营雕版印刷业。

我国雕刻印刷业在经营形式上基本上沿着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发展，具体到河南，官营印刷业一直占居主导地位。五代时期洛阳、开封的雕版印刷也主要是官刻。官刻是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经营管理的出版印刷机构。最早的官刻机构是五代时期后唐设于洛阳的国子监。

后唐建都洛阳。第二任皇帝李嗣源虽是个文盲，但

他却十分热心文化事业。当时的宰相冯道、李愚是经学博士，他们看到民间流行的儒家经典文本不一，为了使读书人有一个标准文本，他们于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上奏皇帝李嗣源，奏疏中这样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请求“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交国子监，由儒官马缙、陈观、段颙、田敏等人具体负责雕版印刷《九经》。李嗣源批准了这一请求，并拨出雕刻经费，“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并对负责人田敏赐赏，以资鼓励。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统治阶级对印刷术第一次利用。但直到后唐灭亡，《九经》雕版也没有完成。继之而起的后晋、后汉、后周，均建都开封，也都承袭了这一事业，仍由田敏负责，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才最后完成，历时21年，由田敏献上“印版《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除此外，还雕印有《孝经》、《尔雅》、《论语》、《经典释文》等书。由于刊刻事业是由国子监所主持，书版也都藏在国子监，所以，世称“九经”为“五代监本九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经典书册。

书籍版式为每半页8行，行16字，小字双行，行21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相近。上版前的清样由四门博士

李鄂和郭嶠书写。对此朝廷也十分重视，屡次颁诏访求擅长书法的书手写样。校勘雕印一直都是在国子监进行。国子监实际上具备了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出版单位性质。参与此事的人员还有国子监博士儒徒多人。

五代时期官刻机构已十分完备，有主管官与一批博学精专的校勘、书写人员，还有众多的刻工、印工和发行人员。雕印的数量与质量也都是空前的。自此“雕印始兴”。

五代时期河南也有民间的私刻、坊刻，但都是零星的且规模也较小。并主要是在士大夫阶层进行，大学士和凝是最为著名的，他曾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之说。但由于五代长期战乱，图书遭受严重破坏，所留史料不多。依据史料记载，应该说，河南雕版始于五代较为合适。

北宋河南雕版业

960年，北宋建立，定都开封。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朝政府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复兴文化事业。太祖、太宗都大力提倡并实行“武功克敌，文德致治”的国策。此外，又将十国小朝廷，尤其南方各国所藏图书收归北宋中央政府，同时，又加强了官刻和复制图书工作。乾德四年，政府下令向民间征书。加之自太宗以后历任的文人皇帝炫耀文治和东京开封文人荟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西京洛阳造纸业兴起等，都为北宋雕版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文化条件，奠定了优越的人文物质基础，使雕版印刷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封继续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出版中心地位。

北宋是河南雕版印刷业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河南的雕印业主要集中于开封。官刻私雕并举，同时，还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书坊。官刻、私刻、坊刻的三大系统至此形成。

这一时期，开封的官营雕印业尤为发达，官营雕印机构更加完备，分工更细。在学府、官府两大分支内，中央朝廷下设机构的刻书占有绝大多数，中央各殿、院、监、司、局普遍经营雕版印书。刻书较多的有国子监、秘书监、崇政院、德寿殿、崇文院以及专业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和秘书监下属太史局掌雕印历书的印历所，此外还有专门供奉皇帝藏书刻书的左廓司局。这些机构有些是编、印、发三位一体，有些只编，不印不发，有些是编印合一。刊印图书最多的是国子监。国子监不仅是宋代社会教育的管理机关、最高学府，同时又带有国家出版社和出版管理机构的性质。其下又专设有印书钱物所。后因名称嫌俗，于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改称国子监书库官，专掌雕印经、史群书。实际上，由于当时太宗主张并实行“武功克敌，文德致治”的国策，全国上下已形成了重学术、习文化的风尚。在其影响下，国子监不仅刻印正经、正史，还校刻了不少医书，如王叔和《脉经》、孙真人《千金要方》、《补注本草》等。此外，宋代内府的崇政院也于咸平三年（1000年）刻印《吴志》三十卷，天圣二年（1024年）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天圣七年（1029年）刻印《律文》十二卷。德寿殿刻印刘球《隶韵》十卷。

国子监书库官作为国子监下设机构，可以说是我国

最早的带有经营性质的官营国家级印刷厂、书店和资金筹备处，并且有专职官员掌管负责印书发行事宜。国子监校勘编辑的书有的在本监印书钱物所或后来的书库官镂版印刷，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拿到成都或杭州等地方镂版。一些在刻地印刷，有些则将镂好的版片运回京师开封印刷成书。这有些近乎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本社编审的书，既可在本社印刷厂排印，也可在其它地方印刷厂排印。这是北宋河南官刻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宋时期中央官府在开封出版的图书经、史、子、集都有，相对而言，集部较少，经、史、子部较多。为方便见，我们依经、史、子、集四部分述。北宋河南出版的经部图书，主要是经书和小学类。经书中最早出版的是《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即：《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据《玉海》记载：“端拱元年（988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版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四人详勘，又再校，十月版成以献。《书》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献。《春秋》则维等三人校勘，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990年）十月版成。《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

月以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人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

《五经正义》为唐孔颖达撰。孔颖达用了二十四五年的功夫，综“考前代之文，采众家之善，随经折理，去短留长”，才撰成此书。此书成后，一直是应科举考试的士子们的复习资料。因为《五经正义》原著篇幅过多，讲经的先生常常编节其中主要内容教授学生，以致到了北宋年间“舛谬潜滋，节略而宗源莫究”，因此孔维才上奏请重加校勘此书。孔维等在上奏太宗的校定《五经正义》书牒中称校勘编辑方法为：“逐部各详于训解，写本皆正于字书。”不到一年，孔维竟至累死。另一校勘官李至上书太宗时指出：“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因此，应派“博贯九经”的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参加校勘工作，以使“问义质疑有所依据”，减少舛谬，重加校刊。太宗遂即批准李至奏请。淳化五年，李至又上书称：“校定之本，仍有讹舛，宜更加刊定复校。因此，该书正道二年又校一次。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刻版成后，又进行了复校，孙奭又校出错误，“改正九十四宗”。直到这时，《五经正义》的校勘编辑工作方才最后完工。校勘次数达六七次之多。

在校勘《五经正义》的同时，宋太宗又命校勘出版《周礼疏义》五十卷、《仪礼疏》五十卷、《春秋公羊传疏》三十卷、《春秋穀梁传疏》十二卷，并令剔纂《孝经正义》三卷、《论语正义》十卷、《尔雅疏》十卷，一同出版。这次总领其事的是李注、杜镐，真宗咸平三年换为国子监祭酒邢昺。其编辑方法为前疏“皆校旧本而成”，“《孝经》取元行冲疏、《论语》取梁皇侃疏、《尔雅》取孙炎、高琬疏，约而修之。”咸平四年十月九日真宗命直讲王焕到杭州负责刻版。景德二年（1005年）刻版镂成，六月国子监将版献给真宗。

据近人王国维称言，北宋所刊诸经疏，流传至今的尚有《周易正义》，日本枫山官库藏有《尚书正义》。别的本子，日本竹添氏有南宋复刊《毛诗正义》，近藤氏有《左传正义》。此外，《仪礼》、《公羊》、《尔雅》文疏也有南宋复刊本。这些经疏图书的版式为小字，其“行款则除《易》疏未见外，《书》疏每行二十四字，《毛诗》与《左传》疏每行二十五字，《仪礼》疏二十七字，《公羊》二十三字至二十八字，《尔雅》疏三十字，皆半页十五行。”

《五经正义》的最后清样抄写多出自赵安仁手笔，《诗》疏则是赵安仁与张致用、陈元吉、韦宿四人书写。赵安仁，《宋史》有传。雍熙二年（985年），考中进士，因他“善楷隶”，被留在国子监抄了一年多的清样。因赵